

廖大伟
主编

近代人物研究

jin dai ren wu

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



廖大伟
主编

近代人物研究
jīn dai rén wù

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人物研究: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廖大伟主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895-0

I. ①近… II. ①廖… III. ①人物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72834 号

责任编辑 孙 莺 邹 烨

近代人物研究: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

廖大伟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4.5 插页 2 字数 381,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895-0/K·1915

定价 45.00 元

代序：彰显被遮蔽的面向和细节

——“近代人物研究：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廖大伟

由东华大学人文学院与上海市历史学会主办，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承办的“近代人物研究：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4月5—7日在东华大学松江校区召开，来自大陆、台湾地区及日本的40多位学者参加了会议。东华大学校长徐明稚、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熊月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王建朗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熊月之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金以林研究员和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蒋竹山助理教授分别作了主题发言。与会者围绕会议设定的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术研讨，既作思想交流，也有观点交锋。大家一致认为，史学是人学，历史人物的研究应该向纵深拓展，应该注重历史人物的多重面向和具体细节，除公领域的呈现，社会网络和日常生活类似介于公私之间的问题同样值得探讨。以往有些历史人物或人物的某些部分被遮蔽了，相信随着视域拓宽一定会被逐渐彰显出来。兹将会议学术观点和大致情形综述如下。

1

一、近代人物关系网络研究

近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联改变了过去相对单一的模式，因此对近代人物的研究必须拓宽视域，关注多个层面。与会者认为对社会网络的探讨，有助于史学领域的丰富和拓展，对加深近代社会的了解和近代人物的研究具有学术价值。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就近代人际关系网络的特点作了宏观又不乏具体的论述，认为每个人都会以自己为中心结成一定的社会网络，这样的社会网络实际上由近到远，彼此的互惠程度与关系程度成正比。近代社会一方面亲缘地

缘关系弱化,另一方面又被人为泛化,甚至将业缘关系亲缘化,因为织网抱团有利于竞争,而个人往往托福于团体。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关系网实质是“投资—收益”关系,在任何一个关系网中,身处其中的行动者都要投入一定的关系成本,以维持网络的可持续性,并且在合适的时机收获其中的利益。关系网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织网的人,一类是在网的人,也可能同时既是织网人也是在网人。近代社会除了政治家注意织网,商人、资本家甚至文人、学者也很注意织网并利用关系网,下层社会也如此,帮会则为典型。张忠民(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以抗战时期上海新亚药厂总经理许冠群为例,探讨了“路路通”现象以及社会网络与事业发展的关系,认为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是制度安排外的潜规则,是对制度安排的修正、补充甚至博弈,可以说无所不在、无处不在。许冠群既为商人也是政客,其周旋于各种社会关系甚至利用完全敌对的社会关系为己所用,个案表明在强有力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攻势下,再严整的制度安排也会因为抵挡不住而被通融和肢解。金光耀(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以为夜校毕业的许冠群能在社会上长袖善舞,这与上海都市的特色有关,当时很多人是通过上海的夜校走上社会并得到了发展,夜校、职校所形成的社会网络不可小觑。章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强调探讨近代人际网当注意几个问题,一是这些网络是怎么编织起来的,二是我们如何来评价这些关系网,因为关于这种关系史料记载通常有限,究竟靠什么关系获得了什么位置,靠什么关系获得了这份利益,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借重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学研究问题的方式、方法。徐有威(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通过对刘志丹与土匪关系的研究,揭示了早期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和艰难性,认为当年化敌为友从事“匪运”的这段历史不该湮灭,其中刘志丹为代表的事例具有代表性。高红霞(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有时候民众并不是一个非常被动的角色,民间社会某些运行方式和行为相当程度上是制约当时中共政策的,对这些方面作深入研究,可以突破现有党史研究的单线性模式。再者,“兵运”与“匪运”虽有区分又往往相联系,所以需要厘清。李一翔(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认为近代中国银行家一般具有多重身份,有银行家转为政治家,有银行家兼政治家,有政治家转为银行家,这样的人生现象固然有社会环境、人际网络等客观因素,但更多取决于银行家自身的主观意图,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银行刻意追求的一种人生境界。邢建榕(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从电

影《梅兰芳》切入,论证了梅兰芳两次访日、一次赴美与上海银行家的关系,认为“梅党”中有许多金融界人士,他们出钱出力,不遗余力,冯耿光便是其中的铁杆分子。白华山(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以地缘、业缘与人脉为视角,论述黄炎培与“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上海地方重建问题,认为1927年后国民党政权对上海控制的加强并不意味市民自治空间的窒息,事实上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下上海市政府、市党部发生的权威危机曾直接导致国民党政权对上海地方社会控制的松懈,这就为地方精英参与地方治理提供了机会和比较宽裕的空间。何品(上海市档案馆副研究员)以馆藏档案为依据探讨了李铭与近代中国金融业的关系,认为李铭是中国近代金融史上一位十分活跃的重要人物,他所参与的各项活动,几乎涵盖了上海近代金融业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其在华资银行界的地位和影响相当出众,尤其银行经营理念和管理实践迄今仍值得借鉴。

二、近代人物日常生活研究

近代社会变动的加剧使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丰富,但迄今为止日常生活的学术探讨还较为薄弱。蒋竹山根据《有泰驻藏日记》探讨了有泰这位驻藏大臣的感官世界和晚清拉萨的社会生活,并且认为日记是研究日常生活的重要史料来源。邵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以《那桐日记》为主要依据,论述了国事与私欲在权贵日常生活的轻重反应,认为那桐之所以轻公重私又能混迹官场,既有家境富庶和人脉良好的原因,也与他个人性格乐观密切相关。戴鞍钢(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翁同龢的政坛操守既反映于为官一面,也体现于日常生活,被其引为知己者屈指可数。尤其罢官遭贬回到家乡常熟后,内心不无愤懑,但又胸怀坦荡,依旧拥有达观的心境。陈祖恩(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以乐善堂在上海《申报》的广告宣传活动为对象,论述了岸田吟香的人生经历、人格魅力和得法的经营运作,认为结交上海文人圈系乐善堂广告运作的一大策略,而行医技能和日常爱好也为成功因素之一。戴建兵(河北师范大学教授)探讨了王士珍的乡居态度和日常社会,认为王氏一生忠于国事,安于乡里,一介武夫,守于规矩,实际反映当时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陈元朋(台湾东华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则以

食品与日常生活为视角,探讨了窝窝头的社会文化史,试图解答窝窝头素材的生态特性与物性、食用者的身体感受、食用者的社会阶层、食品的社会形象以及食品的记忆等问题,认为研究窝窝头其实是一种载体,一种可以转录与转译各种自然与人文影响的物质。唐洲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认为历史人物的日常生活实际蕴含许多信息,破解和呈现有助于人物的立体感。

三、近代人物与时代关系研究

历史有许多被遮蔽的方面,也有很多被遮蔽的人物。张力(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探讨了意大利人罗斯二战后在中国的情形,一方面他作为敌国外交官面临被遣送的困境,另一方面他所收藏的图书至为珍贵,中国当局又不得不考虑对之通融,而这段历史迄今鲜为人知。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以为战败后类似罗斯这样的使领人员在处理上是不是完全适合中国法律是个问题,比如李香兰本来是要被处罚的,但后来发现她是日本人,不适合汉奸处罚条例,所以她得以脱身回了日本。另一个例子就是川岛芳子,起先以为她是日本人,经调查认定是中国人,所以她就被判了死刑,当时有“非国人不受汉奸处罚”的法律规定。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以蒋介石日记为核心史料,论述了1932年蒋介石在干部与组织建设方面认识的变化和与知识界“感情联络”的实施,认为这对于他政治视野的开拓和治国能力的提升意义重大,也为他此后在国民党内确立最高领袖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廖大伟(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以李烈钧与蒋介石的关系为主轴,论证了李烈钧退出政坛,甘淡人生,到九·一八事变后抱病复出,敢言尽力,认为他是将民族利益放在首位的大写之人,退进之间显现了胸襟和境界,言行之中维护了国家大局。邵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以郑观应与上海为视野,探讨了这位香山人的身份转换与人生际遇,认为上海对于郑观应来说无疑是安身立命、成就事业的福地,同时也是他安度晚年之地。苏智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考证程子卿夜闯中共“一大”会场的历史,认为“一大”为什么被发觉,是因为职业革命家马林已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而租界警方事先已经获得共产主义组织要在上海开会的情报,所以法盘界巡捕房派程子卿进入李公馆,

实际是见机行事。王建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认为史料辨别很重要,利用回忆录来论证历史须作考证,“一大”召开在7月23日之后,但我们早先都认为是7月1日。如果回忆录里也持这个日子,那么这样的回忆是不是应着我们以前的说法,如果是,那就要怀疑其可靠性。刘长林(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对1922年上海席上珍自杀案作了探讨,认为该案表明当时社会舆论对法律审判有相当影响,尽管另一方汤节之也有商业组织和同乡会的支持,但审判结果最终还是维护了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观。此外,席上珍自杀事件发生在中国妇女开始走上职业妇女道路的最初阶段,社会舆论通过讨论此事件也注意到了妇女走上职业岗位所遇到的种种问题,从社会舆论到法律审判,都受到了妇女解放思潮的影响,对席上珍这位“新女性”自杀体现的社会意义的话语建构,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特征。徐思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编审)认为珍自杀案涉及几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社会的司法公正问题,一个是言论自由问题、言论空间问题,一个是民间社团的活力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女性解放和女性地位问题,这些都是社会转型中的重要问题,也是衡量我们现代化程度的一个指标,但是公道自在人心,不等于公道可能“今天”就彰显。

四、近代人物的思想演变研究

研究历史必然带有主观性。研究者在进入历史人物心灵世界,在与之对话过程中,就会有这种强烈感受。崔志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探讨梁启超从甲午战争后以日为师,到民初“反日”、“憎日”、“惧日”的转变过程,认为这一认知经历与同时代的孙中山、章太炎等人十分相似,这样的思想演变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时代缩影,反映了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后“大亚洲主义”愿景在现实中的破灭。水羽信男(日本广岛大学教授)以章乃器为代表论述了抗战前夜的中国社会论与自由主义,认为章乃器构想的“万能政府”本身并非独家之说,当时罗隆基也有相同设想。然而通过相比,后者对制约“万能政府”的制度性的关心显得薄弱,章乃器期望正确思想意识指引政党国家,他所选择的社会主义,是作为实现解决民族问题的社会主义。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认为章乃器追求民主,具有社会主义的倾向,但他是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仍值得商

榘。自由主义有个特点是宪政思想,对国家权利非常警惕,注重对权利的限制,而民主主义者认为权利只能掌握在民众手中,宪政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是不同的,所以章乃器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是一个民主主义者,同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刘石吉(台湾“中研院”人文社科中心暨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探讨了清季海防与塞防人物思想言论,认为此争论之起实由两派政治家对拯救中国所抱持的方策不同,以左宗棠为首的塞防论者强调肃清西北动乱的必要,并警觉到俄人在西北边陲的野心;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论者则注意到列强在东南沿海的威胁,并敏锐地感觉到日本侵略的危险性。彼时朝野上下正掀起自强运动的浪潮,着重于洋务之讲求,海防措施自为其中之要项,是为改革派津津乐道。于今看来塞防与海防论者代表清季一批富有新思想的封疆大吏的公忠体国情结,他们言论激昂,爱国心切,颇能切中时弊,鼓动风潮,其意义深长而影响久远。但他们的认识亦有不足者,这是时代的限制使然;这种限制,加上清廷所受传统的约束,尤其处于帝国主义压迫的情况下,其影响所及,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也注定了清廷覆亡的命运。此种历史际遇,对知识分子个人与整个国家民族来说,都是悲剧。

五、近代人物研究的展望

- 6 与会者一致认为文学科的一个核心研究对象便是人,历史是人创造的,汪朝光认为要避免感情用事,主观判断。许纪霖强调要拓展研究路径,挖掘史料,注意吸纳新的方式方法,并且注重历史的细节。他认为史景迁的书非常畅销,如果按照今天的学术标准,那么它绝对不会被接受,因为没有注释,但是它流传下来了,因为它本身的文学性保证了它的可读性。张力指出有些历史人物其实目前还在被遮蔽的,学界除了研究知名人物,还应该关注那些小人物或人物群。人是历史的创作者,是主要的重心,所以我们还要研究小人物或不知名的人物,以及这一类人物群。王维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认为遮蔽问题跟我们20世纪现代学术的转变有关,把西方的科学、规范、方法引进来,尤其是当前的学术规范越来越多,越来越强调科学性。其实人物研究中,强调科学性恰恰把应该发掘的东西给遮蔽掉了,人物有血有肉,我们强调科学性,那么我们就回到

了20世纪初的状态。比如史料史学,我们就不敢在上面加上自己的看法。过去看古书感觉就是“如遇故人夜谈”,现在我们过度相信科学。没有进入到古人的世界中去。崔志海认为人物研究确实有点难度,这体现在主观性上,史料留给我们的有主观性的东西,我们要做诊断,不要以他个人所说的为主,尤其是日记,什么时候写的,他当时写日记也许会把很多东西回避掉。研究四·一二政变时的蔡元培就会发现没有资料,要把邵月之日记里有关蔡元培的记录找出来,同理,要从《那桐日记》找出你要的东西来也很困难,因为他不会随便把什么都记在日记里,所以光凭日记来研究人物有时也不行,凭他自己说的不行,要对其进行甄选,要“破案”。

本次研讨会设大会报告、论文交流和自由发言三个学术环节,每位报告均安排同行点评。与会者普遍认为,本次会议学术气氛浓,学者层次高,论文质量好,为人物研究拓展了视野,并将促进海内外同行的进一步交流和合作。

目 录

廖大伟	代序:彰显被遮蔽的面向和细节	___ 1
	——“近代人物研究:社会网络与日常生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一部 近代人物关系网研究

汪朝光	蒋介石的亲缘关系网络研究	___ 2
	——以战时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为例	
张忠民	“路路通”:抗战时期上海特殊社会网络下的特殊人物	___ 12
	——以新亚药厂总经理许冠群为例	
邢建榕	上海银行家的社会角色与关系网络	___ 32
	——从电影《梅兰芳》谈起	
白华山	黄炎培与一·二八淞沪战争后的上海地方重建事业	___ 37
何 品	李铭与近代中国金融业	___ 48

第二部 近代人物日常生活研究

戴鞍钢	晚清政坛与翁同龢的操守	___ 58
蒋竹山	高原上的纵乐:一位晚清驻藏大臣有泰的感官世界	___ 63
邵 雍	黄海昶 晚清满族权贵那桐的私人生活	___ 72
	——以《那桐日记》为中心	
戴建兵	正定王士珍与乡里社会	___ 75
陈祖恩	乐善堂在上海《申报》的广告宣传活动(1880—1893)	___ 84
李一翔	银行家,政治家,抑或其他?	___ 102
	——近代中国银行家的多面人生探析	

第三部 人物与时代关系研究

熊月之	论近代通人郑观应	114
邵建	郑观应与上海：一个香山人的身份转换与人生际遇	124
张华腾	袁世凯与济南城市早期现代化	135
苏智良	程子卿夜闯中共“一大”会场之考证	149
金以林	蒋介石的 1932 年	163
廖大伟	胸襟、境界与形象：国难之际李烈钧的复出	187

第四部 近代人物的思想演变及其他

刘石吉	清季海防与塞防人物思想言论之探讨	212
崔志海	梁启超日本观的演变与反思	238
水羽信男	抗战前夕的中国社会论与自由主义 ——以章乃器为素材	247
张力	意大利人罗斯在中国	262
刘长林 刘曼丽	从道德谴责到法律审判 ——1922 年上海席上珍自杀案研究	265
杨小明 庞雪晨	郭嵩焘与近代西方天文学	305
陈元朋	窝窝头的社会文化史	319

2

第五部 致辞、报告与讨论

后记	378
----	-----

第一部 近代人物关系网研究

- ◎ 汪朝光 蒋介石的亲缘关系网络研究
——以战时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为例
- ◎ 张忠民 “路路通”：抗战时期上海特殊社会网络下的特殊人物
——以新亚药厂总经理许冠群为例
- ◎ 邢建榕 上海银行家的社会角色与关系网络
——从电影《梅兰芳》谈起
- ◎ 白华山 黄炎培与一·二八淞沪战争后的上海地方重建事业
- ◎ 何 品 李铭与近代中国金融业

蒋介石的亲缘关系网络研究

——以战时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为例

汪朝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一

1927年以后的中国政治,以国民党“党治”为中心,而又受到派系政治和军事权力的强烈影响。以练兵打仗起家的蒋介石,以其对军权的掌控,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实力派,其权力又由军而政而党,渐渐渗透到国民党统治架构的各个方面。抗战爆发以后,为应战时特殊需要而设立的国民党总裁制度,赋予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最后决定权,从而完成了蒋介石以党领政治军的个人独裁的权力建构过程,蒋介石真正成为国民党内说一不二的最高领袖。

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仍然需要通过一定的权力网络实现其统治权力的运用和伸展。在这个权力网络中,亲缘关系据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对亲缘关系的重视,因为个人独裁权力架构对权力运用的特殊需要,因为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迟迟不能完成,建基于法治化、民主化制度体系下的权力运作在中国难以达成其任务,从而使人际关系,也包括亲缘关系,在中国的权力运作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国民党和蒋介石亦不例外。

从蒋介石的亲缘关系网络考虑,大致可以包括如下方面的内容:

1. 蒋介石与宋美龄,夫妻政治与家庭关系。
2. 蒋介石与宋子文、孔祥熙,亲缘政治与亲族关系。
3. 蒋介石与蒋经国,血缘政治与家庭关系。
4. 蒋介石与宋霭龄,亲缘家庭关系。
5. 蒋介石与其他亲戚,亲缘家庭关系。

综合各方面的因素,亲缘关系在蒋介石权力运用过程中的长处主要在于:

1. 居高临下,控制权力,有利于蒋的个人独裁。
2. 一荣俱荣,形成政治权势集团,并经此掌控国事。
3. 政策运用可以得心应手,进退自如。
4. 经由亲缘关系网络的发散而形成更宽泛意义的网络关系架构,以集合人才,为己所用。

但是,有利必有弊,亲缘关系在蒋介石的权力运用过程中也有其短处,主要表现在:

1. 碍于亲缘关系,政治运作不能随心所欲,如蒋介石与宋子文的关系。
2. 一损俱损,受亲缘关系之累,影响政治形象,如蒋介石与孔祥熙的关系。
3. 以亲缘关系私相授受,影响政治的现代化,如蒋介石与蒋经国的关系。
4. 过度依赖亲缘关系,可能导致国民党内其他派系和个人的进取心受到影响,产生离心倾向。

总体而言,在蒋介石大陆执政期间,对亲缘关系网络的构建与依赖,前期较后期为重,有利处亦多,然以形势的不断变化,其亲缘关系网络亦显现更多的弊端,并基本终结于大陆执政期。以下以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关系为例,讨论蒋介石的亲缘关系网络在其大陆执政时期的利弊得失。

二

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三人中,以孔祥熙最为年长,不过,他之成为国民党阵营的要角,也是在 20 年代的国民革命时期。1927 年以后,孔祥熙和宋子文同为蒋所信赖的当家理财之重臣,各有贡献。但是,在蒋介石当政的 22 年间,孔祥熙当了近 2 年的行政院长(1938 年 1 月至 1939 年 11 月)和 9 年半的副院长(1933 年 11 月至 1937 年 12 月,1939 年 11 月至 1945 年 6 月),总计 11 年有余,占了蒋主政时间之半。而且由于蒋在抗战期间的兼职太多,无暇管事,因此,孔在战时虽为副院长,实际却当着行政院的家。反观宋子文,在战前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前后计 4 年(1929 年 5 月至 1931 年 12 月,1932 年 1 月至 1933 年 11 月),其间两度代理院长近 1 年,(1930 年 9 月至 1930 年 12 月,1932 年 8 月至 1933 年 3 月),再从 1944 年 12 月代理行政院长(1945 年 6 月真除)到 1947 年 3 月免职,虽

然当院长的时间较孔为长，但在行政院实际任职的时间只有孔的一半略多，而且实际权力和活动空间也没有孔那么大。解读这种差异的关键因素，在于蒋、宋、孔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

孔祥熙与宋子文同为留学美国名校（孔先后毕业于美国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受到西方文化熏陶，但孔出身山西票号商人之家，与宋出身的传教士之家显然有别。在孔家，留学更多的是镀金，不似宋家那般因虔诚信教而对西方文化有出自内心的领悟，故中国传统文化对孔祥熙所保留的影响显较宋子文为大。与宋子文常常表现的居高临下、自信自傲相比较，孔祥熙给外人留下的印象更多的是谦和敦厚、平易亲近，人际关系自较宋子文为优。兼以孔祥熙自幼浸染于晋商之家的氛围，深谙商人精明算计、注重利益之道，处理政治亦如经商，圆滑融通，不似宋子文那般固持理念、不知进退。孔祥熙曾对陈布雷说：“财政经济在书生看来甚为复杂，其实很简单，即是生意经而已。彼自称，彼从生意出身，故能领略此道。”结果被文人气息甚浓的陈布雷斥为“怪哉此论也！”^①然孔以生意经处理政治和人际关系，自然在国民党内复杂的政治派系和人际纷争中更易立足。尤其是当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说一不二的独裁领袖之后，孔祥熙认定其主政之道即惟蒋是从，对蒋依顺，更不会对钱财用度方面与蒋难堪，自然得蒋欢心。孔能长期坐稳行政院的头把和二把交椅，成为国民政府时期任职时间最长的行政院高官，自有其为官之道，而处理与蒋的关系当为首要因素，正因为孔对蒋的性命是从，蒋对孔亦颇为放手。

4

在1933年11月宋子文辞职、孔祥熙接任之后，孔即对蒋尽心尽力，被蒋认为在“中央散漫无主”之时，“幸庸之不避劳怨，在京主持。”故当孔祥熙“急思尝试”院长时，一向看重独断权力的蒋介石却并无责怪，反认为“此亦一道也”。^②1938年1月1日，蒋介石卸任行政院长，让孔祥熙过了把院长瘾。然孔接任后，有几件事为蒋所不满，一是孔办事庸碌，只知“有财政而不注重整个政治”；二是孔注重谋取私利，不断为舆论所批，“对外失信”，“舆情大恶”；三是孔祥熙一度主持与日本谋和，被主张抵抗的蒋认为是“行同求和，彼犹不知误

① 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1943年11月16日，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390页。

② 《蒋介石日记》，1935年8月10日，11月26日，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

事，可叹”。^①更令蒋“可痛”的是，他本来对孔颇为放手，“一与商讨财政，彼即愤气怒色相加，凡重要事机皆秘而唯恐我知道，我亦乐得不知，一任彼之所为，而彼今以你是领袖之言相加，是全将余助他之好意误会”；甚而有如宋子文之“违忤不从，至为痛苦，因之心情躁急，时用忿怒也”。^②因对孔有所不满，1939年11月，蒋介石复任行政院长，孔祥熙又改任副院长，但即便如此，蒋对孔较对宋的态度仍有明显差别。对宋，蒋是严词厉色，不稍缓和；对孔，蒋则用语温和，不无自责。孔由行政院长改任副院长，是为了“减轻庸兄责任，免受冤屈”；对孔不满时则提醒自己，“对孔何时现鄙嫌之意与严厉之声，应切戒之”；感觉“庸之言行态度皆令人不满”，当“劝其改正”；即便是对孔祥熙下属贩运鸦片谋利这样明显违法之举，蒋的态度也不过是“庸之对鸦片运输事不能遵令停止，以人言籍籍，贪小失大，更为忧闷，故终日郁郁不舒，乃休养不足之过也”。^③总之，在孔祥熙贪污案发前，蒋的日记中甚少记载对孔如同对宋那样过于严厉的批评与责难。

蒋介石对孔祥熙的维护，更明显地表现在对1942年1月反孔学潮的处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攻香港，国民政府紧急派遣飞机去港，接运被困在港的若干知名人士。但当接运专机回渝时，传出只接回孔二小姐和几只洋狗的新闻，遂至引起后方多个城市的反孔学潮。^④蒋介石虽认识到此由于孔祥熙处事不当所致，起初有令孔“辞去”之想法，但又认为“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可胜浩叹哉”。随即又将此归结为“反动派鼓励昆明各大学学生游行示威，以庸之为其目标，文人政客之卑劣污陋，如张君勱之流，可谓丧心病狂极

① 《蒋介石日记》，1938年3月19日，1939年7月12日、19日，8月26日。

②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19日、31日。

③ 《蒋介石日记》，1939年9月2日，11月18日，1941年1月31日，5月26日，1942年12月9日。

④ 除了运狗不运人的新闻外，当时还讹传吴稚晖全家在港被困自杀，郭泰祺、王宠惠、王正廷等均在港或被俘或自杀，“以是一般愈见愤慨”。实际上，上述诸人当时均在重庆，并未遇险，而飞机运狗不运人的新闻经查证亦有不实之处，故反孔学潮的发生虽起于传言，而实有复杂背景，与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不无关系，三青团即在此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三青团团员为争取领导权起见及避免他党讥讽起见，参加者亦多，大部分则为中立分子，为谣言所激动。”（《赵澍致朱家骅》，1942年1月7日，朱家骅档，藏台北“中研院”近史所，档号35-3）因此，蒋介石颇为“震怒”，认为“青年团干部糊涂散漫，一任反动派从中利用与之便，而昏昧不悟”。（《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3日）